

经合组织报告肯定中国结构性改革成效——

效率增长就业充分成经济主动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向G20提交的首份《G20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技术性评估报告》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生产率增长及高水平就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人均收入增速保持高位、分配差距进一步缩小，通过“三证合一”“一站式”监督等“放管服”改革措施减少了行业准入壁垒，提高了整体经济效率

不久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向G20提交了首份《G20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技术性评估报告》，并经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审议通过。《报告》认为，中国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成效显著。

中国的结构性改革进展和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为何能获得积极评价？中国整体经济效率提升的原动力是什么？有关专家接受了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的采访。

劳动生产率稳步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尽管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但增速水平在主要经济体中依然名列前茅。

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是靠资源的粗放投入，还是效率的提升？《报告》显示，2016年，以不变价购买力平价水平衡量的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相比2007年金融危机前增长了约1倍。生产率增长已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生产率的提升，离不开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这三大‘发动机’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动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说。

李佐军表示，近年来，中国改变了以需求管理政策应对挑战的方式，采取结构性改革的办法，有针对性地解决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问题，对生产率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峰认为，随着人口红利的减少和资源环境约束的强化，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转到依靠生产效率的提升上来。近年来，处于转型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结构性改革，激发了市场活力，带动了生产率的提升。

在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经济室副主任陈建奇看来，生产率的提升，离不开教育的投入、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力的迁徙。

陈建奇分析说，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教育投入，已经通过立法将教育支出纳入法定支出，确保教育支出占GDP比重达到4%。与此同时，企业也在加大产业转型升级力度，通过引进先进的设备，促进企业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另外，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劳动力等要素跨城市大规模流动加快，客观上也助推了生产率的提升。

“我国政府重视创新，并不断加大教育投入是促进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



究院副教授李昕说。根据教育部财务司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信息研究中心撰写的《“十二五”中国教育经费发展报告》，“十二五”时期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增速达到了13.05%。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年均增速14.78%，远高于同期年均7.9%的GDP增速。得益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尽管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虽有所下滑，但人均收入依然保持较高增速。

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近年来，尽管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2013年至2016年，城镇新增就业连续四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稳定在5%左右。《报告》认为，高水平就业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持续提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稳定的就业形势，客观地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正不断加强。”李昕说，在全球经济持续多年脆弱复苏，贸易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趋势不断抬头的背景下，就业形势总体平稳，是结构性改革措施的重要成果。

陈建奇认为，我国就业保持平稳，一是由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了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尤其是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加入创业大军，促进了就业增长。其次，互联网催生的新业态快速发展，不少传统行业出现“互联网+”或“+互联网”，引发新业态竞相迸发，对吸纳新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再次，服务业快速发展，增强了就业吸纳能力。

行业准入壁垒减少

《报告》指出，中国实施简政放权，特别是通过“三证合一”“一站式”监督等“放管服”改革，减少了行业准入壁垒，提高了市场总体效率与活力。

在李佐军看来，“放管服”的核心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特别是通过推动政府自身改革，把权力下放给市场和地方政府，努力为企业、创业者等各类市场主体创造更有利于创新、更有利释放活力的制度环境。

“政府的权力下放，就意味着市场主体权力的扩大，活动自由度的增加。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自然会不断提升，市场活力也会被进一步激发。”李佐军说。

“作为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突破口，‘放管服’改革将使政府职能进一步调整，并逐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变。”陈建奇指出，近年来国务院推行权力和责任清单编制试点，通过自贸试

验区探索行政审批等制度改革，企业办事更方便，证照办理时间大大缩短，市场准入门槛降低。

卢峰指出，“放管服”改革实现了政府的自我瘦身和合理化定位，可以更好地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依靠“放管服”改革，可以使政府行为更合理，制度更有效，使体制改革的活力得到释放，更有利推动经济的增长。

李昕表示，2017年以来，我国民间投资增速显著回升、工业企业利润持续增加、城镇新增就业保持较高水平等，这些成绩与“放管服”改革密不可分。

结构性改革须再深化

《报告》在肯定G20各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成效的同时，认为各国需要进一步加强结构性改革的力度。

“根据《报告》，纵向比较看，我国各领域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改善趋势，但从横向看，反映包容性增长的基尼系数、反映市场竞争的营商环境指标等部分指标仍落后于G20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李昕说，尽管我国在九大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的各项结构性指标不断改善，但各指标背后反映的结构性矛盾并未真正解决，结构性改革仍任重道远。

卢峰认为，中国还需在前期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结构性改革。在下一阶段的改革中，应科学界定宏观调控和结构性改革的关系。从中长期看，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重点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上，以改革寻求治本之策，使经济运行更有效率，使宏观经济能够尽快走出下行调整阶段，适应和引领新常态。

“去杠杆等改革将成为未来更加重要的内容，但不能因为要去杠杆而强行压缩债务，这种方式可能促使相关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去杠杆应寻求新的手段。此外，降成本补短板的改革应着眼长远，着力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陈建奇说。

“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改革，而不是结构调整。”李佐军建议，在改革中要把重心真正落到改革上，牢牢抓住制度性改革这一牛鼻子，抓住提高效率这一核心环节，努力依靠创新驱动来拉动经济增长。同时，要进一步拓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范围，在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的同时，加快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构建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等，加快改革经济结构中不合理的制度。此外，还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体制机制等，让企业在结构性改革中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



房贷利率这样调整

一段时间以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纷纷上调首套房贷利率，一些二三线城市也陆续跟进。其中，部分商业银行已调高首套房贷利率至贷款基准利率的1.1倍。这是什么原因？后续还可能如何发展？

北京网友蒙奇奇：目前各地的房贷利率都是什么情况？

主持人：据监测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首套房平均利率为4.73%，环比上月上升4.64%。同比去年5月份的4.45%，上升6.29%。在其监测的35个城市首套房平均利率中，最低的为大连4.43%，最高的为石家庄4.99%。

全国533家银行中，提供9折以下优惠利率的银行有12家，较上月减少30家，占比2.25%。其中，8家银行提供8.5折优惠利率，1家银行提供8.2折优惠利率，1家银行提供8.8折优惠利率，2家银行提供8.9折优惠利率。此外，104家银行提供9折优惠利率，较上月减少170家银行，5月份共有132家银行提供9.5折优惠利率，较上月新增4家；244家银行执行基准利率，较上月增加174家银行。

同时，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提供房贷利率优惠折扣银行数占比下滑幅度大，涉及的城市银行数量多。二线城市银行利率上升幅度范围大于一线城市。

江苏网友一根葱：银行为何这样调整？后续还会提升吗？

主持人：当前资金成本不断上升，超过房贷利率，商业银行需要控制房贷业务的成本，因此可以理解此次调整是银行自身在权衡之后主动实施的一次市场行为。通过上调首套房利率，银行相应增加房贷业务收入，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对房贷需求实行了更大力度的筛选。

进入6月份，房贷政策或将进一步收紧。从往年经验看，6月下旬金融市场资金都较为紧张，在今年金融去杠杆压力下，银行纷纷上调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大额存单利率等，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流动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可能会进一步收紧房贷，加大对资质较差客户的审核。但具体情况会否如此，还是要看资金价格上行的速度。

天津网友默默：刚需购房人群应该如何应对？

主持人：对于刚需购房人群来说，国家的住房调控政策，都是为了保护刚性需求，抑制投资投机性需求。如5月份《住房市场发展月度分析报告》显示，随着调控政策的渐趋严厉，5月份热点城市房价涨幅整体回落，北京房价首次出现下跌，其中西城区下跌8.43%，海淀区下跌7.45%，领跌于全市各区县板块。

对此类购房者来说，在买房的时候要综合考量，量力而行，购房前要咨询清楚能否拿到房贷、贷款利率是多少，以及合同里的各项规定等都要仔细了解。

(主持人 钱善施)

签就业合同有讲究

实现从校园到职场的转换，毕业生需要关注自身基本权益，谨慎择业，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四川网友有为青年：作为应届大学毕业生，我们经常会接触到各种合同，其中最多的就是劳动合同和劳务合同。这两个合同是一样的吗？

主持人：弄清楚这个问题很重要。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劳务合同通常意义上是指雇佣合同。二者在合同性质、合同目的、主体及其关系、法律调整等方面都有不同之处。尤其是当合同发生争议时，前者必须经仲裁前置程序后，司法机关才能介入，争议应适用劳动法的规定处理，仲裁机构或法院可以裁判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合同解除应遵循一定的法定程序。对于后者，法院可直接受理，适用民法的规定处理；解除没有什么特别程序，双方均可随时解除雇佣关系。

辽宁网友双响：在签订劳务合同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主持人：无论工作还是实习，建议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尽可能签订书面协议。不同于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是基于双方约定而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要明确约定提供劳务的期间、劳务的内容、劳务费标准、结算周期、结算方式等。如接受劳务方为公司等法人组织，则书面协议中最好加盖公司公章；如接受劳务方为自然人，则书面协议中最好显示有身份证号码及签名。其次，如无法签订书面协议则应注意留存相应证据，比如派工单、派工短信、派工邮件等证明双方间存在劳务关系的证据，以及能够证明劳务费标准及支付情况的证据。一旦发生纠纷且协商未果，劳动者则需要依法维权。

山东网友孜孜以求：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经常都会约定试用期。这对刚入职的大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主持人：如今的用人单位出于自身利益、双向规划等考虑，通常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并往往将此作为自己的“尚方宝剑”，动辄以试用期不合格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用人单位以劳动者在试用期以不合格为由解除劳动关系的，应该在试用期内提前通知。试用期届满时，劳动者将自动转正，超过试用期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是违法解除。

(主持人 李万祥)



全球经济亟待结构性改革

——访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程实

本报记者 陈果静

定价权来减轻石油美元体系的内生脆弱性；四是增强全球宏观审慎监管的沟通与协作；五是尝试建立超主权的金融市场稳定机制；六是切实推进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七是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各类税收减免。从国别层面看，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需求侧的竞争性宽松只会缓解短期痛苦，结构性改革的力度和效果将决定各个国家在全球新格局中的未来排序。

2017年，对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债务和央行的双重极限已不断逼近。“加快结构性改革——改善生产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新的增长路径，各国宏观政策也正从危机应对向中长期经济治理加速转变。

记者：当前我国正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进展如何，有哪些亮点？还有哪些亟待破解的问题？

程实：在G20成员国结构性改革普遍不及预期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认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亮点主要集中于五个层面：

第一，“三去一降一补”以“去产能”为核心发力点实现先破后立，有效推动

记者：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

势，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着力？如何平衡内外因影响？

程实：今年下半年，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在两个层面加速深化：其一，由于上半年的经济反弹改善了企业盈利、扩大了政策空间，“三去一降一补”有望在下半年加速推进。至今年年底，清理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杠杆和政府“放管服”改革预计将取得阶段性成果。其二，十九大的召开有望为国企改革和税费改革注入新动力。通过加快国企混改试点推广，去除行政垄断、弥补经济短板；通过加码税制改革和结构性减税，降低企业负担、激活民间投资。由此，阶段性的“三去一降一补”改革成果将转化为长效化的制度红利，释放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潜力。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亟需完善长效化的预期管理。第一，加强政策前瞻指引的层次性和策略性。以市场语言加强政策解读，让市场更清晰地理解中国宏观政策搭配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第二，提升对全球治理的引导力。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变革，将中国业已具有的强大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体系中的规则引导力和秩序影响力，不受制于人。



结构性改革是中国在G20杭州峰会上为构建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开出的“一剂良药”，也获得了各国的认可。针对各国结构性改革相关问题，《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程实。

记者：在当前的国内外经济背景下，为何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程实：目前，全球政策在需求侧上的发力已经接近瓶颈状态，全球经济亟待一场结构性改革。

从全局层面看，全球结构性改革包含几大关键内容：一是借由G20等多边对话机制推动全球治理在新常态下的应时改变；二是削弱国际货币体系对美元霸权的依赖；三是通过多元化大宗商品

